

77534

大 连 文 史 资 料

第 五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1988年9月

审核定稿：蒋永维、田将庆、王多闻

编 辑：王胜利、卓武山、董 方、于礼萍

大 连 文 史 资 料

第 五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大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1092×787 1/32 字数：135,000

印数：1—2,000册 工本费：2.30元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内）第：0005381

目 录

缅怀邹火鹏同志·····	张树汉 谷庆福 (1)
输送干部上前方的一段历程·····	徐攻玉 (10)
李长年被俘后二三事·····	郭兆林口述 长海县政协整理 (17)
反“升科”斗争与宋风桥·····	马 群 (28)
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	花儿山乡文化站稿 德臣 开仁整理 (31)
击毙日寇安住·····	王世安 (34)
旅顺监狱回顾·····	(日本) 古贺初一 徐宗志译 王士震校 (36)
大连机械制作所罢工事件的演变过程·····	杨志云 (44)
关于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情况及其它·····	门恩福 (48)
简忆旅顺高公师范部·····	葛治谟 (55)
回忆金州农业学堂·····	崔拱武 卜钟声 谷庆福 (63)
关于“南金书院”的由来·····	李浩田 (70)
日寇统治时期的一次金银建风潮·····	郭习朴 (74)

我所知道的满洲兴业银行·····	孙耀庭口述
	黄本仁整理 (81)
一起政治谋杀案·····	史 志 (90)
一支反动武装是怎样转变为革命武装的·····	徐攻玉 (97)
记蒋介石视察青年军·····	伍蔚文 (105)
蒋经国给我的印象·····	伍蔚文 (113)
大元帅府近卫团长吴浩·····	吴竟成 (117)
肃亲王善耆在旅顺·····	孙械蔚 (122)
恭亲王溥伟在大连·····	孙械蔚 (142)
旗人在大连地区·····	瀛云萍 (155)
盛拜的后裔在庄河·····	瀛云萍 (163)
参加足球活动的回忆·····	罗仙樵 (168)
永丰塔记略·····	尚允川 (190)
满铁图书馆的西文藏书·····	汪喙海 (193)
补白:	
金州“益友社”·····	孙玉良 (62)
东北十六省·····	罗仙樵 (192)

缅怀邹大鹏同志

张树汉 谷庆福

邹大鹏同志是我的老首长。解放前，在胶东区党委情报部工作时，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5年秋，我随大鹏同志从胶东渡海经庄河挺进东北，在东北局工作期间，我一直为大鹏同志作保卫工作。与他相处时间较长，因而他所给予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胆识，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体贴、关心同志和爱护他人胜过自己的情怀，深受党内外同志的称道。

邹大鹏同志原名宝丰，曾用名蕴华，1936年始用现名。1907年旧历5月出生于辽阳市三块石堡子一个贫农家里。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满洲省委委员、中共晋西北调查局局长、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长春市市委书记、长春特别市市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等职。1967年4月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终年六十岁。

他六岁入小学，四年后考进了辽阳县城高级小学，品学兼优，得到学董张文宣和校长韩国勋的器重，享受免缴学杂费的待遇。在他们的关怀下，又做通了家长的工作，于1921年春升入凤城县省立第二师范。就读期间，每月三元六角钱的官费，仅够支付伙食钱。虽然伙食极差，但他每天仍坚持“开夜车”，所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受“五卅”风暴的影响，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师生曾举行过罢课、游行示威，震撼了反动当局，也促进了青年学生的进一步觉醒。青年时代的邹大鹏同志，从这时起便接受了反帝反日教育，对共产党及国共合作的内幕开始有所认识。

1925年夏季，借暑假回家探望二老之机，顺便筹措入关路费。父亲性情刚强，望子成材心切，不惜以高利借得“奉币”百元（合大洋四十元）以遂儿子心愿。入关抵北平，正值各校招生，原拟报黄埔军校，但因身材矮小，军校体检极严，不得不改变初衷。此时，汉阳兵工厂去平招收亦窝军医学校新生，踌躇之中在同乡祁某资助下，缴了五元报名费，经过初试及格，又赶赴汉阳以优异成绩顺利经过复试关，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1926年，大鹏同志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10月，他被派往齐齐哈尔、昂昂溪等地，以中学教员身份作掩护，任满洲省省委委员兼做地方党团工作，积极为党筹措经费，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倾注全部精力为党工作。这个期间，北满地区的学运、工运、农运（尤其是鲜族基本群众）都有较快的发展。共青团的组织建设也有较大的进展。1930年春，邹大鹏被调往哈尔滨负责共青团兼做党务工作。他继续深入群众进行组织发动工作，赤色工会、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群众组织皆蓬勃发展起来，并有效地发动了一次反日筑路运动，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正当各地群运方兴未艾之际，党、团中央先后派巡视员——林彪之叔兄林仲丹（化名张浩）和邹旭去哈地，批判邹大鹏等同志犯有“右倾”错误。他们竟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切实

际地组织党团员、赤色工会会员、近郊农民协会会员数百人，赤手空拳去冲击日本驻哈领事馆。面对着武装的敌人，付出了近五十人被捕的代价。

当他被派往安东商科中学任数学教员兼做学生工作期间，还积极为抗日义勇军邓铁梅部筹款和选配干部。1932年他率干部（非党积极分子）5人，穿过敌人层层封锁，到达邓的驻地，受任政治部主任，并草拟政治工作条例及农民协会章程等文件，很受邓的赏识。他还建议：小部队驻原地（南满和安奉铁路之三角地带，南临渤海由海路同关内保持联络，并接受枪械弹药等项的接济），坚持打游击；大部队则应转移到安奉路以东通化、桓江、临江、濛江（今靖宇）以至长白山地区（即以后杨靖宇率部活动的地区）。虽获邓的赞许，但邓总舍不得离开原地，结果屡遭日寇围剿，终于不幸被俘，英勇就义。

1933年，王明派往满洲的代表执行“左倾”宗派主义路线，又以“右倾”错误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1934年冬，大鹏同志又被派往马占山的骑兵军，给马占山将军做秘书工作。期间，配合骑兵军六师秘密党支部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着力于上层，因而骑兵军与红军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推动官兵坚持了抗日。大鹏同志1936年重新入党后，在第六师继栗又文之后担任党支部书记。

1943年夏，大鹏同志这时已从晋绥调回延安。同年秋在分局任书记的林枫同志三次电请中央社会部，邀大鹏同志返晋绥担任情报部第五分局局长（1942年中央组建调查局毛主席兼局长，情报部属调查局领导，下设若干分局）。屡遭磨

难的大鹏同志，1941年开始在晋绥搞情报工作，在整风审干期间，又蒙冤于“特嫌”受到隔离审查，且不准与家人相聚达八个月之久。他提出种种保护白区工作干部的正确意见，均未被采纳。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终于为邹大鹏同志一一作出公道的评价。在逆境中他也一如既往，以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把组织安排视为天职。

1944年夏秋之交，中央又拟调他前往胶东区党委作情报部长工作。任务是搜集山东和东北地区的情报，并派人找寻抗联残部与之建立联系；建立延安至胶东途径华北敌占区之可靠交通线；建立胶东至华东之海上交通线，为“七大”之后中央有些负责干部需经此路线前去华东、东北做好准备。他感到此行虽有曹里怀等数人，然而任务艰巨，风险颇大，但还是欣然接受了。临行前，周恩来副主席约他参加在杨家岭自己住地——窑洞里召开的三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刘澜波、宋黎外，还有中组部代表王鹤寿。他们在会上详尽地叙述西安事变之后筹组东北救亡总会及在北平成立之始末，阐述了其宗旨、任务，认为绝大多数成员是好的或较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不应予以怀疑，把整党期间在党校学习的皆以“特嫌”编于“特别支部”是错误的。周副主席一一做了记录，并说：“邹大鹏同志就要走了，‘东总’真相也已大白，‘临别赠言’我当予以重视。”

赴胶东之前，因毛主席工作繁忙，委托叶剑英（参谋长）等同志分别与他谈过话。当途经晋绥军区时，在军区领导的要求和经中央的同意，他在军区驻地停留数日间，频繁与分局有干部接触，一方面做思想工作以消除整风审干积下的怨气，同时又留心了解华北地区之敌情。经中央批准，随员

和家属暂留晋绥，十二月只身渡黄河前往胶东。路经晋绥八分区时，正值敌人扫荡过后，窑洞皆被破坏，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干部战士不得不改住地窖；缺粮无菜，生活极端困苦。这时，疲劳加严寒，大鹏同志又染上重感冒。更为艰辛的是当进入敌占区，沿同浦路行进时，不但需改装平民，而且夜间遇到敌堡还得匍匐前行。反复闯关卡与敌周旋当中，邹大鹏同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出色的文韬武略。在敌占区过关卡之外，在走路、住店都经常与小股零星敌伪官兵遭遇，有时令他们猝不及防，但敌人对这位传奇式人物甚为恐惧。因工作需要，大鹏同志对伪军除以言慰之，并晓以抗战救国是国人之大义的道理。他身负重任，延安至胶东之行，一路上与敌人斗，与严寒、饥饿、疾病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如期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侦察任务。

1945年我党“七大”闭幕之后，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西欧战场希特勒的垮台，侵华日寇的灭亡指日可待。据此，便决定抓紧向日寇占领下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派遣敌工干部。果不出中央所料，“八·一五”日寇降服。于是奉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向大城市挺进。胶东部队首脑机关准备进驻青岛之际，中央于8月29日电令明确指示：晋察冀与山东均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进驻已开进东北之苏联红军的后方，随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已在胶东区党委搞情报工作的邹大鹏同志，接到电令后立即着手组织力量，准备从海路进军东北。此时，适逢从延安取道胶东赴东北开展工作的吕其恩、柳运光、吕塞（又名吕其恕）三人先期到达胶东驻地。共同研究决定，组织了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大鹏同志任工委书记，成员有吕其恩、于克、柳运光、吕塞四人。又从

东海军分区独立团抽出一个连的兵员，同时组织干部陈迈谦（陈云涛）、王德真、李光、段品三、李进国、隋从新、张先文、徐仁清、王成学、王春太、初克己、张树汉等同志随行。并配备电台一部，台长为韩均德（韩彬），摇机班同志十余人。8月末集结于刚解放的烟台市，筹划乘船渡海北上。工委对外宣称：“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邹大鹏同志为政委，吕其恩为司令员（七大代表，建国后曾任哈尔滨市市长），于克为副司令员（原胶东区党委城工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吉林省省长），政治部主任为柳运光（七大代表，曾任大连地委副书记）。

先遣队首要任务以全力搞船和物资。柳运光、吕塞二同志在烟台一渔行找到吕其贵（吕塞的本族叔弟）搞到汽船。由吕塞带一个排的兵力为先遣，从海路赴大连探路。在两天仍未有回音的情况下，全体成员分乘两艘汽船经一昼夜的艰苦漂泊抵达目的地——王家岛（吕其恩的老家，原属庄河，现为长海县辖区）。趁夜突袭驻该岛的伪警察分所，活捉伪警长毕、杨二人，缴获全部武器。接着在岛上架设电台，及时地向胶东区党委和延安中央社会部报告了情况。中央回电，令“抓紧在庄河登陆”。9月7日邹大鹏同志一方面派出有侦察经验的李光化装渔民乘船出岛，潜入庄河县城搜集情况；一方面在王家岛就地走访群众，访贫问苦，用带来的米面救济群众。在岛上还召开批斗伪警大会，分化瓦解伪职人员。群情激昂，出现青年踊跃参军的新局面。

邹大鹏等同志根据报告侦知苏军尚未进驻庄河；国民党正在该地公开活动，伪县长及其操纵的警务队在“静待中央”接收，遂利用伪县长关德权与家住王家岛的汪伪烟台市

警察局特务科主任姜某之间的“亲密关系”(关知道他是国民党“军统”山东行动委员会第三支队的情报员)一事上做文章。所有随员和战士乘用水上警务船和两艘汽船于打拉腰子口岸登陆,派出小分队缴获该警察分所枪械。并令伪屯长吕某同伪警赵某和伪县长在电话里通话,佯称“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渡海作战先遣支队前来接收庄河,应速派车来港欢迎!”事虽突然,但对他们却是既敏感又很具诱惑力的。伪县长为防不测,连夜召集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孙某、执委刘某、伪县府科级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并指派伪警务科长于某率警察数人前去侦探虚实。敌人虽狡猾,但在人民武装面前也难逃脱应得的惩罚。最后,还是被缴械了。

解放庄河当天,邹大鹏同志通过支队电台将这一消息分别上报胶东区党委和延安中央社会部,并建议速增派大部队沿支队路线挺进东北。同时,接获中央电令:与所属地区苏联驻军司令部取得联系,立足丁庄河,扩大队伍……在沿海组织船只,筹足粮食,迎接山东待命出发的四万大军和地方干部;适当向外扩展,为后续部队登陆创造条件。于是,加紧行动,很快地缴获了庄河县境内六个伪警察署的枪械,武装了近千名新入伍的战士,壮大了先遣队。

1945年9月12日,庄河区民主联合政府宣告成立,解散了维持会,结束了日伪在庄河十四年的统治。为贯彻中央指示,以庄河为据点,分三路相继向东、北、西扩展,收复安东,力克岫岩县城。当拿下皮口、普兰店、瓦房店三镇后,组建了新金县民主政府。1945年11月邹大鹏同志调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12月,东北局机关拟撤出沈阳迁往本溪之前,他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身体虚弱又一次病倒。由潘汉年同志为他找到贺诚

同志给予诊断，认定病情较重，不宜随机关转移，遂留下。经调治，病情渐有好转，即赶往本溪。不久又随机关迁去抚顺和梅河口。这时国内局势吃紧。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向东北调兵遣将，大举进犯各大战略城镇。东北局机关的任务更加繁重，邹大鹏同志几乎每天都在彭真、林枫同志处工作，开会至深夜。国民党军侵占沈阳、长春后，党为了取得重要军事、政治情报，1946年2、3月份，邹大鹏同志亲自化装潜入长春市内，深入虎穴侦察到重要情报，为我军于1946年4月14日在周保中、林枫同志的指挥下，一举攻克长春，消灭驻军铁石部队的重大胜利，作出了贡献。但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迷心于内战，气焰十分嚣张，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由海陆空向东北增兵。当敌军攻占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地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挑起了全面内战。为贯彻中央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党政军于1946年6月撤出长春。东北局机关、民主联军总部均设于哈尔滨，继续指挥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活动。这时邹大鹏同志除担任社会部部长外，还兼任民主联军总部秘书长、东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交际处长等职。工作再忙他也抽时间找干部谈心做思想工作，深受党内外同志的拥戴。在东北地区工作过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如高崇民、陈先舟、车向忱等同志与他相处得亲密无间。每次开完会，他总要用自己的专车把他们送回家。1948年在筹划围攻长春的战役中，他出任长春市工委书记，10月19日长春解放又被委任为长春特别市市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后任军委联络部部长和调中央某部工作。

邹大鹏同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尤其注意团结党外同志。关心他人胜过自己。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对下属更是关心倍至，与他共过事的老老同志无不称道。如在西安事变立过战功，原东北军骑兵六师少将师长刘桂五将军，于1938年4月挺进东北时光荣殉职后，一直默默无闻。后来在邹大鹏与刘澜波的关怀与建议下，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61年7月25日庄重地追认刘桂五将军为革命烈士。

邹大鹏同志是我党情报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他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了一生。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输送干部上前方的一段历程

徐 攻 玉

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由于苏军军管，避免了国民党政府的“劫收”。从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就派各解放区的大批干部来大连发动和组织群众，迅速完成各级的建政工作。在中央、东北局和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制订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培养干部，支援解放战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大连地区的安定环境，举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训练和造就了大批党、政、军、经、文各类人才，陆续输送到东北各地和南方新解放区的部队和地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争取全国的解放，建立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这段历史我有过亲身的经历。

我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军刚解放瓦房店时，由当时地下党员、我的中学老师张逸秋介绍，参加陈云涛（陈迈谦）率领的民主联军第五支队的。10月中旬，接收了曾被恶霸势力统治的公安局后，我被任命为总务科副科长。（陈云涛在大连市政府为副市长，张逸秋在金县政府当秘书长。）

1946年，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在全国挑起了内战。东北我军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撤离了铁路沿线和一些重要城镇。到秋冬时节，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辽南大部分地区，直抵石河苏军岗外。在这严峻的形势下，组织上为了培养干部，于1947年2月抽调我和干事

张金铎、技术员冷传章三人，到大连警察学校学习。

大连警察学校，又名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是1946年冬与从安东（丹东）撤进来的学校合并成立的。它是当时大连市委培训党、政、军干部的重要教育基地。校长是边慎斋（边章五），教育长是陈美福和一位姓朱的同志。我们编在六队，是学政治的。课程有《新人生观》、《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和当前形势等科目。这个队共分八个班，每班十多人，全队约百人。学员大部分是从全市公安系统抽调的连排级干部，多数是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也有一部分是抗日老战士和安东来的尚未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我中学同学顾明善等人）。我们六队队长姓姬，政治指导员是左风波，都是营级的抗战干部。校址就在岭前小龙街，现军医学校那里，路南的多栋小楼是日本人遣返回国后空出来的，我们就一个班住一栋。

我们的学习生活很紧张，管理也较严格，家住金州的学员，星期天也不准回去。不过，我们的学习情绪还是蛮高的。学习的方式是讲授和讨论，既学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又联系革命工作实际，越学越觉得心明眼亮。特别是对当前形势的研究讨论，使大多数同志对解放全中国充满信心。同时感到我们所以能在这样安定的环境中学习，正是由于千千万万战友在前方英勇战斗换来的，所以，我们既珍惜这次学习的好时光，又想着战斗的前方。学习上，同学们不但踊跃发言，争出学习板报，发表学习心得，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还在学习空隙，练唱革命歌曲，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校园内真是歌声不断，意气风发，大家准备随时投入新的战斗。正当大家专心致志学习时，五月七日，学校突然召集我

的全队开“上前方”动员会，由教育长代表学校宣布了东北局和大连市委的决定：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前方需要大量干部，充实各方面力量，因此，决定让六队提前结业，全部开赴前方。并且规定，由于时间紧迫和机密，大家都不要回家和到原单位辞行，会后立即整理行装，当晚出发。

上前方！这真是既诱人又吓人的字眼。当时，我们学习和工作都和前方有联系，也随时准备根据工作需要上前方。但这毕竟是我们革命征途上的一大转折，到真正要上前方时，又不能不有所震动。我们六队，不管是老战士还是新干部，大部分都在大连市内安了家，工作环境也一直是安定的。现在突然要抛家别亲开赴尚不知去向的前方去战斗，思想上怎能不涌起巨大的波澜，但能得到去前线的机会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回到宿舍，立即收拾行装，把不便携带的物品，装箱寄回家中，并写信向亲人辞别。

傍晚时候，我们乘上卡车，直奔大连海港，登上了停靠在码头上的一艘苏联货船。船上除了我们全队人员，还有别的单位上前方人员，人数比我们还多，并且有带着吉普车的高级干部。因是货轮，客舱很少，我们都是住在货舱，用自己行李打地铺。只是在船上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六、七个人，不用说，他们开小差了。可见，战争对于一个人的考验是严格的。随同我们一起上前方的还有几位既是干部家属又是工作人员的女同志。

轮船在夜幕降临后起锚开航，岸上万家灯火，随着船行而缓缓远去。我们大家倚在甲板栏杆边，无不思绪起伏，叨念着：别了，大连，胜利后再见吧！夜幕中看不清巨轮驶向

何方，但总的目标是定了——上前方。

直到夜深，大家才回到舱底躺下，听着波浪拍船，谁都没有睡沉。第二天，大家迎着朝阳到甲板上，看到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象，心境也平静多了。晚上，船在一个港口停靠了。这时，我们发现码头上的人都讲朝鲜话，原来是到了北朝鲜的镇南浦港。出国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大家都是既困惑又兴奋。由于当时是秘密的军事行动，组织上不让我们下地自由活动。约近半夜，我们集体下船，紧接着登上停在码头上的火车货厢。火车很快开动，通过平壤，不停地向北奔驰，直到天又黑了，火车才停下，这才知道到了朝中边境的满浦镇。这里是鸭绿江东岸，隔江就是我国吉林省的辑安县（现集安县），是我军辽东部队在四保临江之后新解放的。在满浦镇下火车的只有我们队，原来其它单位人员已从别处转赴哈尔滨等前方去了。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来到鸭绿江边。江上只有两只小木船，我们分批乘渡，在桨橈吱嘎声中，从朝鲜又回到祖国的辑安城。

辑安城虽然才经战火，街市比较破败，气候也较大连冷些，但踏上自己的国土，大家心情都较安定。组织上让我们在兵站休息。三天后，领队的政治指导员左凤波同志向我们正式宣布：上前方的目的地是长白山下的临江。现在要徒步行军三天，到六道江再乘火车前往临江城。大家一听到要徒步行军几百里路，为了顺利行军，忍痛把不太必要的物件抛弃了，把棉被里的棉花也掏出来送给了驻地附近的老百姓，个个只背着简单的被单或毯子、牙具等轻便物品登程了。

我们从辑安动身，沿着已不通车的铁路和公路线向临江进军。刚走起来觉得挺轻快，一路歌声嘹亮，步伐整齐。我